

目 录

总序.....	iv
第一章 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历史梳理	1
1.1 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源起	2
1.1.1 从达契亚罗马人到罗马尼亚人.....	2
1.1.2 从多瑙河拉丁语到罗马尼亚语.....	3
1.2 封建公国时期语言使用状况	4
1.2.1 各公国语言的阶级分化.....	4
1.2.2 书面罗马尼亚语的形成.....	5
1.2.3 罗语的“再拉丁化”进程.....	7
1.3 民族语言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7
1.3.1 民族语言意识与民族权利斗争.....	7
1.3.2 统一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转向.....	9
1.3.3 极端民族主义与语言纯化政策.....	12
1.4 社会主义时期语言能力概述	13
1.4.1 马列主义主导的语言政策.....	14
1.4.2 国家通用语的规范和普及.....	15
1.4.3 “全面向东”的外语教育路线.....	18
第二章 当代罗马尼亚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建设.....	20
2.1 罗马尼亚国家语言治理机构组成.....	20
2.1.1 科学院：语言规范的制定者.....	21
2.1.2 议会：语言立法和监管者.....	23

2.1.3	政府：语言法规的践行者	26
2.1.4	法院：语言案件的裁判者	27
2.2	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规划及其落实	28
2.2.1	涉及语言规划的主要法律	28
2.2.2	语言规划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2.3	欧盟框架内的罗马尼亚语言治理	37
2.3.1	罗马尼亚对欧盟语言政策的回应	38
2.3.2	与欧盟一致的罗马尼亚语言立法	40
2.3.3	欧盟对罗马尼亚语言生活的监督	43
2.4	罗马尼亚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小结	46
 第三章 当代罗马尼亚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建设		50
3.1	罗马尼亚国家通用语普及和推广	50
3.1.1	针对少数民族的国家通用语普及	51
3.1.2	面向外国移民的罗马尼亚语推广	62
3.2	罗马尼亚语使用规范的落实情况	67
3.2.1	规范性词典与学校教育	67
3.2.2	罗语规范的多途径普及	70
3.3	罗马尼亚的国家语言智能化建设	71
3.3.1	国家语言智能化起步的背景	71
3.3.2	国家语言智能化的主要成果	73
3.3.3	国家语言智能化面临的问题	75
3.4	罗马尼亚和谐语言生活构成要素	78
3.4.1	罗马尼亚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概况	79
3.4.2	罗马尼亚族际语言关系典型案例	85
3.4.3	罗马尼亚语方言分布与使用状况	92
3.4.4	新媒体时代的罗马尼亚语言生活	97
3.5	罗马尼亚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小结	101

第四章 当代罗马尼亚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建设	106
4.1 罗马尼亚国家多语能力建设状况	107
4.1.1 国家多语能力的定义和阐释.....	107
4.1.2 罗马尼亚对多语学习的态度.....	109
4.1.3 罗马尼亚多语教育状况评析.....	111
4.1.4 欧洲国家国民多语能力对比.....	123
4.1.5 罗马尼亚的汉语推广与传播.....	128
4.2 罗马尼亚语国际拓展的主要特点	133
4.2.1 覆盖区域和领域较为广泛.....	136
4.2.2 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一致.....	143
4.2.3 在欧洲的影响力逐步提升.....	144
4.3 罗马尼亚对外话语表述能力简介	146
4.3.1 国家领导人话语发布渠道多样.....	148
4.3.2 国家机构严格按法规发布信息.....	151
4.3.3 国家媒体话语影响力较为有限.....	153
4.3.4 多方位构建国家话语外译能力.....	157
4.4 罗马尼亚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小结	161
第五章 总结和启示	164
5.1 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最明显特点.....	164
5.2 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167
参考文献.....	169
法规条约.....	183

总 序

“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丛书”是201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该项目是国家语委首批立项的重大科研项目，立项的背景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但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能力不相匹配。国家语言能力是“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它是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也是硬实力的支撑。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时，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军事实力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国家军事能力展现的是使用“硬武器”的成效，国家语言能力展现的是使用“软武器”的成效。国家层面的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活动都需要强大的国家语言能力作为保障。

2016年“国家语言能力”首次写入教育部与国家语委制定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该规划中明确写道：“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应。”从本质上说，国家语言能力的强盛取决于国家综合国力，但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不会自动地促成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换句话说，强国可助强语，强语可助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强国定能强语。在目前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迫切需要我国政府加强领导，社会组织和学者群体高度关注，以形成共识，从战略层面进行规划，并采取相应措施，使我国国家语言能力与其综合国力相匹配，让国家语言

能力助推综合国力，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这就是本课题的重大战略意义。

本课题组自获批“‘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这一重大科研项目以来，深知责任重大、意义深远。本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三角理论”，即国家语言能力由三部分组成：（1）国家语言治理能力；（2）国家语言核心能力；（3）国家语言战略能力。这三个分项能力又各涵盖3—4个维度：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包括治理机构体系构建、规划制定与实施、语言生活研究与交流；国家语言核心能力涉及国家通用语普及、国家通用语规范使用、国家语言智能化与国家语言和谐生活建设；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则包括国家外语教育、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和国家对外话语表述。可以看出，三个分项能力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国家语言治理能力位于顶端，指政府处理国内外两类语言事务的效力和效率，具有全局性和统领性特点，决定着核心和战略两类能力的发展方向和效果。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特点，是国家政治安全、领土完整、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信息安全等的压舱石，是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发展的前提，应置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优先位置。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着眼未来，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特点，是国家对外开放、维护国家主权、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支柱，对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建设有促进作用。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又反作用于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建设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人和张天伟教授、杨佳博士后、董希骁教授、詹霞副教授、戴冬梅教授、李迎迎教授、邵颖副教授、张佳琛博士、董丹博士、汪波副教授等人共同努力，以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为依据，融合中外视角，对中国、罗马尼亚、德国、法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荷兰、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语言能力开展了个案式的深入调查分析。《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是团队取得的首批研究成果。《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全面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三个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彰显了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优势，同时也审视其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梳理了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历史，并对其发展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为探究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目标、路径和模式上存在的差异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材料。除了《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外，“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丛书”第二批著作《德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法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马来西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荷兰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韩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我们希望能够为学界提供双向互动比较的内外视角，探究中国和其他国家语言能力发展体系的异同，由此借鉴外国经验，提出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的策略，最终将我国建设成世界语言文字强国。丛书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文秋芳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2021年5月1日，劳动节

第一章

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历史梳理

罗马尼亚位于中东欧，地处巴尔干半岛东北部，濒临黑海，国土面积 238,391 平方公里，居全球第 83 位、欧盟第 9 位。全国划分为 41 个县（省级行政区）和 1 个直辖市（首都布加勒斯特），下设市、镇（乡）。其领土西接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南邻保加利亚，北部和东北部则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接壤。喀尔巴阡山脉呈弧形绵亘在罗马尼亚中部，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居于弧内，弧外东部是摩尔多瓦丘陵，南部则是瓦拉几亚平原。多瑙河自西向东，沿着该国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两国的国境线流淌，最终折而向北，在罗马尼亚东部的多布罗加地区汇入黑海。因此，欧洲史书中经常用喀尔巴阡山—多瑙河—黑海（Carpatho-Danubiano-Pontic）来标定罗马尼亚人世代生活的区域。据罗马尼亚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1 月公布的数据，该国总人口约 2,217.1 万¹，其中罗马尼亚族（简称“罗族”）约占 90%。罗马尼亚语（简称“罗语”）不仅是主体民族的母语，也是全国通用语和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需要说明的是，罗语同时还是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国语，但该国的两部重要法律对国语的命名方式存在分歧，本书将在相关章节中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1 罗马尼亚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insse.ro/cms/sites/default/files/com_presa/com_pdf/popdom1ian2019r.pdf（2019 年 10 月 23 日读取）。

1.1 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源起

1.1.1 从达契亚罗马人到罗马尼亚人

罗马尼亚人和罗语的起源可追溯到罗马人对达契亚的占领。古时的达契亚包含潘诺尼亚平原、喀尔巴阡山麓、多瑙河两岸，濒临黑海，是一个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的地区（冯志臣 2012：2）。当地操色雷斯方言的土著达契亚人曾与古希腊人有商贸往来，并在冲突中与凯尔特人、罗马人开始了最初的文化接触。在图密善（Titus Flavius Domitianus）统治时期（81—96），罗马帝国与达契亚人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战争，双方互有得失。直至公元 2 世纪，图拉真（Marcus Ulpius Nerva Traianus）才通过两次战争（101—102，105—106）彻底征服达契亚，并于公元 107 年在其领土上设立行省，正式揭开了达契亚的罗马化进程，行省内受罗马文化浸染的居民被统称为达契亚罗马人。图拉真在多瑙河两岸修筑了诸多城堡和防御工事，这些设施逐渐发展为城镇，并与行省内部的若干城镇一起成为罗马化的中心。彼时，上层社会的土著达契亚人已被清除殆尽，下层人口也因战争而锐减。罗马帝国当局为了开采达契亚境内的金、铁、盐、大理石等资源，从其他行省迁来许多官员、矿工、军人和商贾，实行殖民统治。在城镇中，行政机构使用标准拉丁语，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则使用来自帝国各地的殖民者所使用的、带有不同方言特征的民间拉丁语（亦称通俗拉丁语）。在乡村，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罗马殖民者占据，达契亚人或是沦为雇农，或是进入罗马军团服役，也逐渐掌握了民间拉丁语。公元 212 年，卡拉卡拉（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Caracalla）皇帝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¹，正式废除了罗马公民与行省民的区别，帝国境内的臣民都可取得公民权，并将拉丁语钦定为帝国的官方语言。这一敕令对于达契亚行省影响深远：一方面，官方语言地位的确立为拉丁语在行省内的推广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达契亚人获得公民身份后，族际通婚现象显著增多，达契亚罗马人从而加速蜕变为一个

1 本书附有附录“法规条约”，故正文中引述法规条约的内容时不再标注其参引信息。



新的民族——罗马尼亚人。

1.1.2 从多瑙河拉丁语到罗马尼亚语

来自帝国各地的拉丁方言融入本土元素后，逐渐生成了一种独立的拉丁方言形式——多瑙河拉丁语。它是当地土著居民同罗马军人、官员、商人、移民沟通的唯一手段。作为一种地域性民间拉丁语，多瑙河拉丁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民间拉丁语，但与意大利南部方言有些许相似之处（董希骁 2005）。现代罗语以多瑙河拉丁语为基础逐步发展而来，显现出不同于其他现代罗曼语族语言的特性。

多瑙河拉丁语向罗马尼亚语的蜕变是以罗马帝国的衰落为前提的，因为只有当游牧民族开始侵占帝国的领土，帝国统治江河日下的时候，风光不再的拉丁语才有可能大量接纳来自其他语言的元素。多瑙河拉丁语在公元 2 世纪中期达到鼎盛，公元 3 世纪后随着罗马帝国的衰微而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由于该地域同罗马帝国隔绝，多瑙河拉丁语开始异化，向民族语言演变（冯志臣 2012：3）。公元 271 年，在哥特人等游牧民族的侵袭下，罗马皇帝奥勒良（Lucius Domitius Aurelianus）被迫将达契亚行省的罗马人迁移到多瑙河南岸。当时撤离的主要是罗马军人、公务员和富人，大多数平民则留了下来。尽管罗马帝国对达契亚的统治仅仅持续了 165 年，但是在语言、习俗乃至信仰等方面，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居民已经被罗马化了。因此，罗马人放弃达契亚行省后，这一地区仍然参与了多瑙河拉丁语的继续发展。在与土著居民和游牧民族的长期接触中，多瑙河拉丁语融合了达契亚语的语音基础，并从达契亚语和周边民族的语言中吸收了部分词汇。由于城镇生活的没落，词义乡村化的现象开始出现。为了适应乡村生活，多瑙河拉丁语中原有的许多词汇发生转义，或彻底消失了。与此同时，达契亚地区的居民运用来自拉丁语和达契亚语的词缀创造了很多衍生词，并且开始从阿尔巴尼亚语和希腊语中借用词汇。公元 313 年《米兰敕令》颁布后，基督教成为受罗马帝国官方保护的宗教，在帝国全境迅速普及，多瑙河中下游地区亦不例外。到公元 4、5 世纪，由于与西罗马帝

国的联系被阻断，达契亚地区的居民将拜占庭帝国作为延续其文化和宗教生活的最大倚仗，并从拜占庭帝国吸纳了诸多希腊语和斯拉夫语词汇，但拉丁语的语法特征和基本词汇得以留存。由于远离主流罗曼文化区，罗语如同一个孤儿，在陌生多样的巴尔干环境里，受先天和后天因素交织影响，形成了一种特殊性格（张明明 2018：15）。

语言是民族身份最显著的标志。一个民族改变其语言，往往意味着一个新民族的产生，罗马尼亚民族与语言的形成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如果从罗马人撤离达契亚行省开始算起，一直到公元 6 世纪罗语具备雏形，这一过程持续了三个多世纪。在此期间，出现了一种广泛通行于古代达契亚地区的原始罗马尼亚语，由于没有方言差异，也被称为共通罗马尼亚语。公元 6—10 世纪是罗语形成的后期，这一时期罗语已经适应了当地人的发音习惯，在语音方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因地域差异而分化出四种方言形式。其中仅有多瑙河北岸使用的达契亚罗马尼亚方言发育繁盛，成为现代罗马尼亚语的基础，其余三种被统称为多瑙河南部方言（*dialecte sud-dunărene*），使用范围极为有限，且均未发展为所在地区的官方语言。共通罗马尼亚语的使用者构成了罗马尼亚民族的雏形，其中绝大多数人为从事农牧业的自由民，其社会组织形式则为乡村氏族，对书面语言的需求不明显，因此罗语仅以口语形式存在。

1.2 封建公国时期语言使用状况

1.2.1 各公国语言的阶级分化

公元 7 世纪，封建制度开始在罗马尼亚人生活的土地上萌芽，通过贵族间的联盟，一些大小不一的早期封建国家组织形式开始形成。在周边民族的不断侵袭和相互争夺中，一些“后来者”在该地区占据了重要地位，例如匈牙利人从公元 9 世纪开始成为一些小国的宗主。12 世纪后，来自不同方言部落的斯拉夫人在与当地居民融合的过程中被逐步罗马尼亚化，一些人成为早期的贵族阶级。在民间，斯拉夫农牧民与罗马尼亚



人进行频繁的产品交换，大量斯拉夫词汇进入罗语。在上层社会，斯拉夫贵族则引进古斯拉夫语作为宗教和行政语言。这是一种东南部斯拉夫语，其中的马其顿方言后来演变成文学语言，亦称教会斯拉夫语。公元9世纪，罗马尼亚人已基本皈依基督教，但没有自己的上层教会。到11、12世纪，罗马尼亚人在传播宗教思想或世俗知识时，广泛使用教会斯拉夫语进行书写。

12—14世纪，古老的达契亚领土上出现了三个较大的、以罗马尼亚人为主体的民族的公国，即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也称罗马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1176年，匈牙利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被立为公国，但仍依附于匈牙利王国。由于这一地区人口较少，匈牙利当局采取了特殊的殖民政策，将大量操德语的萨斯人（日耳曼人的一支）和操匈牙利语的赛库伊人迁入特兰西瓦尼亚，但操罗语的底层民众依然占人口的绝大多数。1310年，瓦拉几亚公国在巴萨拉布一世（Basarab I）大公的领导下将版图从喀尔巴阡山麓扩张到多瑙河三角洲和黑海，并于1330年击溃匈牙利军队，实现了公国的独立。1359年，博格丹一世（Bogdan I）带领一批追随者来到摩尔多瓦，与当地贵族一起推翻了匈牙利统治，使摩尔多瓦成为继瓦拉几亚之后第二个实现独立的罗马尼亚人公国。

总的来说，一直到15世纪，上述三个公国的语言使用状况都是割裂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罗马尼亚平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罗语，但仅限于口头交流，尚未形成文字。匈牙利王国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将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两个公国则将教会斯拉夫语作为官方语言和宗教语言，使用者主要限于受过教育的贵族、教士以及一小部分商人。

1.2.2 书面罗马尼亚语的形成

在可能享有受教育权利的人群中，贵族对于创制书面罗语普遍缺乏热情；教士则表现得十分积极，有一种能够被多数人接受的书面语言对于传教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书面罗语是为满足神职人员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罗语文本都是宗教典籍的译本。商人的流动性强，且与底层民

众广泛接触，在书面罗语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521 年被学术界视为罗马尼亚书面语言有史料可查的起始年份，留存至今的最古老文献《尼亚克舒书信》就是在这一年写成的。

这封信的笔者是肯普隆市的商人尼亚克舒，收件人为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布拉索夫市市长。经商途中，尼亚克舒发现了土耳其军队入侵特兰西瓦尼亚的动向，因此致密函禀报。信函简短精练，用西里尔字母书写。开头和结尾的套语用的是当时公文体流行的斯拉夫语，信函正文使用罗语，表述流畅自然。文字拼写遵循一定的正字规则，从拼写文字的语音来看略具地区语音特征，但不影响现代人阅读和理解。文中的用词大多源自拉丁语，偶尔有斯拉夫语、匈牙利语和希腊语词源的词汇（冯志臣 2012：5）。该书信的句子结构十分规范，可见在此之前，书面罗语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期。绝大多数早期罗语文本是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宗教抄本，其中包括大量教会斯拉夫语宗教典籍的罗语译本。按当时的普遍文化程度，即便这样的文本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阅读的。这些译本最初的作用是教学，用以培养已经掌握或正在学习教会斯拉夫语，且有罗语书写需求的教士。当时使用的西里尔字母主要源自保加利亚语，因无法涵盖所有罗语音位，还从塞尔维亚语中借用了个别字母。即便如此，罗语中的一些特有音位只能用发音相近的西里尔字母来标示。

在书面罗语形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教会斯拉夫语仍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占据着官方语言和宗教语言的地位，但罗语作为民族语言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书写和使用也更为简便。因此，罗语在两个公国的行政事务、文化教育和宗教活动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并开始取代教会斯拉夫语。1577 年，柯列西执事（Diaconul Coresi）首次提出了在教育 and 印刷书籍中使用罗语。17 世纪后半叶出现了用罗语创作的文人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多索夫特伊（Dosoftei）大主教创作的圣经诗歌。他效仿波兰语，参照民间语言的语音对文学语言进行了改革，并率先提出要制定适合罗语的西里尔字母正字法。1688 年问世的首部《圣经》罗译本即采用了多索夫特伊改良的正字法，这为罗语文学语言的产生奠定了基



础。此外，一批编年史家也致力于用罗语著述，大大推进了书面罗语的传播和发展。

1.2.3 罗语的“再拉丁化”进程

17 世纪末，奥地利占领了特兰西瓦尼亚和周边地区，当地的知识阶层开始崇尚德语文化，部分知识分子皈依天主教，一些教士也到罗马学习。1784 年，德语被宣布为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官方语言，但在行政和教育机构中，匈牙利语也被广泛使用。1907 年，匈牙利语成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罗语仅在部分（东正教和希腊天主教）教会学校中被讲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18 年（Stanciu 1995: 91）。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由于这两个公国由奥斯曼宗主国派遣的希腊裔大公治理，希腊语的广泛使用将书面罗语的发展引入了新的轨道。俄土战争爆发后，沙俄军队深入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伴随而来的是深受西方影响的俄国文化。在这一时期，罗语的词汇构成受到斯拉夫语、德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希腊语等语言的影响。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罗马尼亚诸公国或是与西方世界直接交流，或是以日耳曼人、希腊人、俄国人为主要媒介引进西方文化，来自法语、意大利语等罗曼语族语言的大量词汇进入罗语，这一进程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末，被称为罗语的“再拉丁化”或“再罗马化”。

1.3. 民族语言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1.3.1 民族语言意识与民族权利斗争

18 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在以罗马尼亚人为主体的各公国中萌芽，在异族的统治下，罗马尼亚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受宗教和世俗压迫最深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迫切需要证明本民族在古老的达契亚土地上生存的合法性和连续性，进而争取民族权利。为此，阿尔迪亚尔学派（Școala Ardeleană）的代表人物欣卡伊（Gheorghe Șincai）、布达伊-德莱亚努（Ion Budai-Deleanu）、马约尔（Petru Maior）、米库（Samuil Micu）

等人（见图 1.1）率先对罗语的拉丁起源，以及罗马尼亚民族的拉丁属性进行了科学论证。除了出版《布达词典》《罗马尼亚语语法》《罗马尼亚语初始》《达契亚罗马尼亚溯源》《罗马尼亚及其他民族的历史》《罗马尼亚人的历史、经历和事件》等代表性著作外，他们还曾尝试用拉丁字母来书写罗语，但未获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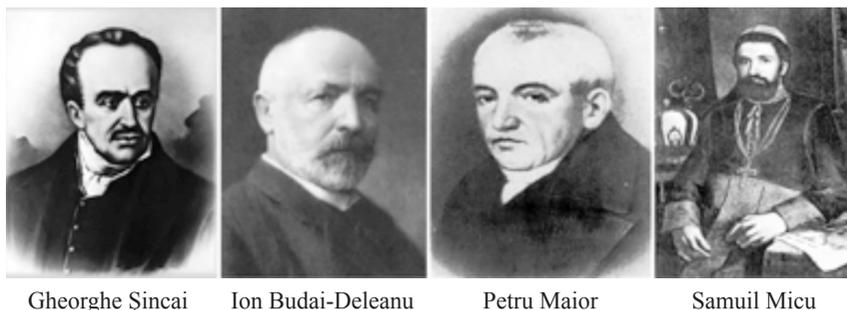


图 1.1 阿尔迪亚尔学派代表人物

该学派秉承的理念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具有反巴尔干化、反斯拉夫化的特点（Munteanu 2004a）。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从阿尔迪亚尔学派开始，罗马尼亚人意识到了语言对于加强民族认同、谋求民族独立、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并尝试通过语言学研究来表达政治诉求，实现民族理想。在语言的实际使用层面，阿尔迪亚尔学派也是罗语书面化的重要践行者。其代表人物均有在罗马、维也纳、布达佩斯等地游学的经历，精通拉丁语和各种现代语言，但他们坚信罗语“高贵”的拉丁血统，更倾向于用拉丁语和罗语写作，而非德语和匈牙利语（Munteanu 2004a）。1828年，著名语文学家埃利亚德-勒杜雷斯库（Ion Heliade-Rădulescu）再次提出用拉丁字母书写罗语并编制现代罗语正字法的设想。同时，他还极力主张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培育民族语言，用罗语讲授法律、数学、地理、历史等课程。

19世纪是罗语发育成长的鼎盛时期。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使经济和阶级关系急剧变化，并将民族解放运动推向高潮。1821年弗拉迪米雷斯



库 (Tudor Vladimirescu) 在瓦拉几亚领导的起义标志着罗马尼亚近代史的开端。1829 年俄国取代土耳其将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纳入其保护范围之后, 民族和阶级矛盾愈发尖锐。而当 1848 年欧洲革命的浪潮席卷罗马尼亚各公国之际, 资本主义理念与民族理想迅速融合在一起。在欧洲各弱小民族弘扬民族意识、争取民族独立的大背景下, 罗马尼亚各界对民族语言予以特别的重视, 将其视为赖以生存的首要因素。抛却其他矛盾不谈, 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三个公国的学者在推行民族语言政策、将罗语作为统一文化用语方面始终保持着一致 (Munteanu 2004a)。众多学者和一代代作家把毕生心血融入自己的民族语言, 罗语著述日益丰富, 为后人留下厚重的文化遗产。这一时期, 罗语普遍应用于教育培训、文学创作、新闻出版、戏剧表演等领域。

1.3.2 统一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转向

1859 年,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先后选举库扎 (Alexandru Ioan Cuza) 为本国大公, 从而实现了两个公国的统一, 改国名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联合公国 (Principatele Unite ale Moldovei și Țării Românești), 但仍尊奥斯曼帝国为宗主。1864 年联合公国颁布《教育法》, 规定高中讲授的语言类课程包括罗语、拉丁语、古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 但除了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之外, 其余均为选修课, 女子中学的学生则只需在现代语言中选修一门 (Bunescu *et al.* 2004: 31-35)。1866 年库扎大公退位后, 摄政府邀请德国霍亨索伦家族的卡罗尔一世 (Carol I) 担任大公, 并颁布了首部《罗马尼亚宪法》。¹ 这部根本大法参照当时最先进的比利时宪法制定, 正式将国名定为“罗马尼亚”, 规定了大公的权利和义务, 淡化了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地位, 为争取国家独立奠定了法理基础 (Stearns & Langer 2001: 522)。但是, 宪法中对语言只字未提, 对民族语言的研究、规范和管理主要是通过学术机构完成的。1866 年罗马尼亚文学协会 (Societatea Literară Română) 成立, 1867 年改称罗马尼亚科

1 瓦拉几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曾先后在 1831 年、1832 年颁布过具有宪法性质的《组织法》。

学协会 (Societatea Academică Română), 1879 年更名为罗马尼亚科学院 (Academia Română)。自成立伊始, 该机构就将培育民族语言列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 并确立了三项紧急任务: (1) 基于拉丁字母编制统一的罗语正字法; (2) 编写一部罗语语法; (3) 编纂一部罗语大词典 (Munteanu 2004b)。来自全国各地的 14 位创始成员超过半数 是作家或语文学家, 他们在成立仪式上纷纷表示, “是语言将我们团结在一起” “语言永远与人民共命运” “必须保持罗马尼亚人居住省份语言的一致性” (Rusu & Simion 2010)。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罗马尼亚科学院的主要研究课题都是围绕罗语设立的, 语言学家们沿袭 “拉丁主义” 理念, 从各个层面不断对文学语言进行净化和规范化 (冯志臣 2012: 5-6)。科学院对以往制定的正字规则加以总结, 并迅速在新成立的雅西大学 (Universitatea din Iași, 今雅西 “亚历山德鲁·约安·库扎” 大学)、布加勒斯特大学 (Universitatea din București, 简称 “布大”)、大部分中小学、政府机关以及部分媒体机构中推广。此后, 在马约雷斯库 (Titu Maiorescu) 等学者的坚持下, 以往一些过于注重 “拉丁性” 的做法得到纠正, 科学院在制定语言规范的过程中开始兼顾民间成分和口语元素, 这为语言规范的普及铺平了道路。

1878 年,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联合公国凭借在俄土战争中的胜利赢得了独立, 并于 1881 年改称罗马尼亚王国。1884 年, 卡罗尔一世国王授命哈什代乌 (Bogdan Petriceicu Hasdeu) 领衔编写科学院词典。这是罗马尼亚语言能力建设史上一项旷日持久的宏伟工程, 无数语文学家先后参与其中, 直至 1949 年才出版了词典的 A—L 卷。1916 年, 罗马尼亚王国加入协约国, 向奥匈帝国宣战, 正式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 该国借欧洲格局重组之机, 于 1918 年 12 月 1 日完成与特兰西瓦尼亚的 “大统一”, 实现了建立一个 “所有罗马尼亚人的国家” (史称 “大罗马尼亚”) 的夙愿。随着版图迅速扩大, 新并入领土上大量少数民族裔 (主要是匈牙利族和日耳曼族) 的存在改变了该国原本相对单一的民族构成, 这对民族国家建构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语言认同不仅是历史问题, 也是备受公众瞩目的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 基于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



的原则，推行“罗马尼亚化”成为该国政府大力推行的国策。语言学家们也以半官方身份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旨在科学论证罗马尼亚人在“大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权利”。1919年，普什卡里乌（Sextil Pușcariu）在克卢日主持建立语言博物馆，这也是罗马尼亚首家历史语言学研究机构，其宗旨体现出鲜明的政策导向：“搜集所有罗马尼亚人居住地区的词汇素材，提供相关语言学方案和建议，旨在实现罗马尼亚文字的统一，广泛激发民众对民族语言问题的兴趣，培养语文学研究各领域的专家”（Pușcariu 1921）。1920年签订《特里亚农条约》时，罗马尼亚外交官还以德国语言学家韦根（Gustav Weigand）编制的《罗马尼亚语言地图册》为据，要求重新划定罗匈边界，确认特兰西瓦尼亚属于罗马尼亚（Munteanu 2004c）。

统一的“大罗马尼亚”从语言地位、民族身份、语言权利等层面入手，对语言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1923年颁布的宪法将罗马尼亚定义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并正式将罗语确立为国家的官方语言。这是该国历史上首次通过基本法来对语言地位加以认定。由于《凡尔赛条约》中包含关于少数民族的条款，在一战结束之初，罗马尼亚对少数民族的态度较为积极和温和，并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少数民族的法律（Scurtu & Bazatu 1999: 6）。例如1923年宪法中有六处提到，所有罗马尼亚公民，无论具有何种民族、信仰、语言属性，均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履行同等的义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国的语言政策，特别是语言教育政策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罗马尼亚化”倾向。1924年颁布的《国家基础教育和基础师范教育法》规定罗语为公立学校的教学语言，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应建立一批使用相关民族母语教学的公立学校，但这些学校的罗语课程必须达到规定的课时数，少数民族教师必须通过罗语考试，校长也必须掌握罗语。这部法律同时还规定，已丧失母语能力的罗族公民有义务将其子女送到用罗语授课的公立或私立学校就读。显然，这一条款是针对在外族统治期间，部分罗族人语言发生“异化”，导致语言属性与民族属性不符的问题制定的。针对公立学校的外语教师，这部法律要求他们必须兼授罗语、罗马尼亚历史和地理、公民教育或社会实践等课程。1925年通

过的《私立教育法》要求私立学校无论使用何种教学语言，都必须讲授罗马尼亚语课程，并用罗语讲授罗马尼亚历史和地理。1928年颁布的《中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在公立中学，少数民族语言只能作为课程开设，而不能作为教学语言。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只有在少数民族学生达到一定规模（初中每班30人、高中每班25人）的情况下，才可以用该民族语言授课，而且不接受非相关民族的学生旁听。罗语、罗马尼亚历史和地理、公民教育是所有中学的必修课程（Bunescu *et al.* 2004：13-300）。1930年，罗政府又要求所有大学都用罗马尼亚语授课。

1.3.3 极端民族主义与语言纯化政策

1930年，卡罗尔二世（Carol II）篡夺其子米哈伊一世（Mihai I）的王位并实行专制统治，民族政策也迅速转向保守，原本具有民族整合内涵的“罗马尼亚化”理念迅速演变为“民族纯化”政策，语言则成为推行这一政策的突破口。是否将语言作为认定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准，直接影响到一些地区民族构成的统计。例如1910年匈牙利开展人口统计时，将说匈牙利语的犹太人全部算作匈牙利族，以此来提升其治下特兰西瓦尼亚等地匈牙利族人的占比。1930年罗马尼亚进行人口普查时废弃了语言标准，强调从人种、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来综合定义民族属性，要求犹太人另行登记。此举大大稀释了匈族的占比，并变相限制了犹太人的语言权利。犹太人身后没有母国支持，且没有民族语言作为显性身份标记（他们已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能够熟练使用其居住地的通用语，如罗语、匈牙利语、德语或俄语），当时并未被当作一个民族对待，仅被称为“犹太人”，而非“犹太族”。这意味着如果他们的母语不是罗语，就无法充分享受法律规定的母语教育权利。尽管罗政府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在教育体系内实行了一系列“语言纯化”措施，但由于缺乏强制性，相关举措的落实并不顺利。罗公共教育部（Ministerul Instrucțiunii Publice）¹ 1935年发

1 在罗语中，instrucțiune、învățământ、educație等词均有“教育”的含义，不同时期命名教育主管部门时可能采用不同的词汇，中文名称均译作“教育（部）”。



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学校的“罗马尼亚化”进程并不彻底，甚至是完全失败的（Angelescu 1935）。

20世纪30年代末，法西斯势力在罗马尼亚迅速崛起，政府在处理语言事务时也开始受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1938年颁布的宪法中删除了所有对各民族平等权利的表述，与语言相关的条款仅保留了对官方语言的规定。在此期间，少数民族普遍遭到打压，除了日耳曼人的生活境况相对宽松，部分德语学校得以保留外，其他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权利基本无法得到保障。1940年，苏联要求罗马尼亚依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割让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罗马尼亚在丧失领土的同时，也失去了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其中以乌克兰族、俄罗斯族和犹太人居多，这导致该国的民族和语言构成更趋同质化。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罗语在民间的普及程度大幅提升，在行政和教育机构中的地位也得到空前巩固。甚至国家元首的个人语言能力结构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卡罗尔一世在成为大公前精通德语、法语和英语，但只学过一年罗语，其登基誓言是用法语发表的。其继任者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同样出生在德国，在继位之前对学习罗语兴趣索然。卡罗尔二世虽然因其私生活混乱而饱受诟病，篡夺王位、独裁统治、依附纳粹等倒行逆施的做法更是令人不齿，但作为一位在罗马尼亚土生土长的君主，他自幼跟随名师约尔加（Nicolae Iorga）学习罗马尼亚语言、文学、历史和地理，在使用和普及罗语方面毫无保留。二战期间，罗马尼亚领土几经易手，人口和民族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主导下，罗语作为官方语言和全国通用语的地位得以确立，为罗马尼亚之后几十年间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奠定了整体格局。

1.4 社会主义时期语言能力概述

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¹领导发动武装起义，宣布废除

1 1948年与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合并，更名为罗马尼亚工人党，1965年恢复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名称。

法西斯专政，停止对反法西斯联盟各国的军事行动，并于次日建立了一个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随后，罗马尼亚军队调转枪口对德宣战，直至战争胜利。1947年，米哈伊一世国王退位，罗马尼亚历史开启了新的篇章，进入了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时期”（罗马尼亚称之为“共产主义时期”）。以1965年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执政为分水岭，可以将这一时期分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1947—1965）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1965—1989）两个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罗马尼亚的语言政策时常处于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中。

1.4.1 马列主义主导的语言政策

在社会主义时期，罗马尼亚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改变，不再遵循原先以“罗马尼亚化”为宗旨的狭隘语言民族主义理念。依照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语言观，语言的同化应自然发生，而非强迫，因此各民族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应得到推崇，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剥夺公民选择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列宁也在《需要强制性国语吗？》一文中指出，语言的同化只能由内而外、自愿地、悄然地进行，采用强制手段推行民族语言沙文主义只能适得其反：“我们不赞成……强制的成分……强制性国语总还是少不了强制和灌输……而强迫只会引起一种后果……加深敌对情绪，造成无数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隔膜等等”（转引自张友国 2010：106）。鉴于此，无论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1948年颁布，1952年修订），还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1965年颁布）均未对官方语言进行定义，但多次提到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母语权利。例如1948年宪法第24条规定：“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保障各共居民族使用自己的母语，并用母语组织所有层次教育的权利。在非罗族居住的地区，行政和司法活动应采用相关民族语言的口头或书面形式开展，并在该民族或其他民族中任命懂得当地民族语言的公务员。”此外，这一条款还规定“所有层次的学校都有讲授罗马尼亚语和罗马尼亚文学的义务”。此后修订或颁布的宪法更为重视各民族的母语权利，但删除了所有关于将罗马尼亚语言文学作为必修课的表



述。例如 1952 年和 1965 年版宪法不仅对司法活动中行使母语权利作了更详细的规定（例如在诉讼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借助翻译了解卷宗内容），还明确了各民族用母语出版书籍、发行报刊、演出戏剧的权利。

除了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之外，与语言权利和语言能力相关的规定更多体现在教育法和政府文件中。1948 年，罗马尼亚公共教育部（Ministerul Învățământului Public）下令在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各个教育层次全面开展少数民族母语教育，罗语课程则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讲授。1968 年颁布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法》重申了各民族的母语教育权利，并指定由教育部负责培训少数民族母语教育所需的教师人员，组织编写少数民族语言教材。根据相关条款，少数民族学生有权自由选择在其居住地的民族语言学校或罗语学校就读。此外，部分学校还被允许使用国际通用的外语开展教学。1978 年版《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保障母语权利的措施，例如要求开设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高等院校、系科和专业，包括夜校和函授学校。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广泛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这部法律还规定，用少数民族语言开展教学的机构也应讲授罗语，从而确保了罗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在教育体系内的地位。

1.4.2 国家通用语的规范和普及

从立法角度看，各民族的母语权利被反复强调，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罗语作为事实上的国家通用语，其优势地位和普及程度并未因此受到影响，甚至还大幅提升。这主要应归功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语言学家对罗语规范化所作的贡献，其二是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

自 1948 年起，罗马尼亚科学院本着“为劳动阶级服务”的原则进行了重组，在布加勒斯特、雅西、克卢日三地设立了语言学研究所¹。在

1 后经多次重组和更名，现分别为：（布加勒斯特）“约尔古·约尔丹—亚历山德鲁·罗塞蒂”语言学研究所（Institutul de Lingvistică „Iorgu Iordan - Alexandru Rosetti”）；克卢日—纳波卡“赛克斯蒂尔·普什卡里乌语言学和文学史研究所”（Institutul de Lingvistică și Istorie Literară „Sextil Pușcariu” - Cluj-Napoca）；雅西“亚历山德鲁·菲利比德”罗马尼亚语文学研究所（Institutul de Filologie Română “A. Philippide” - Iași）。

社会主义时期，这些实力雄厚的研究所是罗马尼亚最重要的语言治理机构，在政府支持下启动了一系列基础性研究课题，许多成果都被冠以“宝库”“国家级”“文化和学术丰碑”之名。1949年，布加勒斯特语言研究所（Institutul de Lingvistică）成立，由约尔丹（Iorgu Iordan）担任所长。同年，历史、语文和民俗学会（Societatea de Științe Istorice, Filologice și Folclor）成立，1968年更名为罗马尼亚语文学会（Societatea de Științe Filologice din România）。1953年，科学院颁布了新的罗语正字法。这版正字法得到了语言学界的高度认可，沿用至1991年（Munteanu 2004d）。1961年，布加勒斯特语言研究所内增设语音学和方言学研究中心（Centrul de Cercetări Fonetice și Dialectale），由罗塞蒂（Alexandru Rosetti）担任主任。在社会主义时期，上述机构完成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成果包括《现代罗马尼亚语词典》《罗马尼亚语正字、正音和发音指南》《罗马尼亚语释义词典》《现代罗马尼亚语》《罗马尼亚语正字、正音和形态词典》《罗马尼亚语史》《罗马尼亚姓氏词典》，等等。尽管罗马尼亚有着悠久的语言学研究传统，但具有规范性意义的著作和辞书如此密集地出版，历史上尚无先例。有赖于社会主义时期教育行政体系超强的执行能力，相关研究成果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推广，出版机构和新闻媒体的纯国有性质也确保了语言规范的有效落实。1958年，约尔丹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旨在认识、解释并消除日常口头表达中的语言错误。为此，科学院于1971年专门设立了语言培育委员会（Comisia de Cultivare a Limbii），当时几乎所有语言学家都在报刊、广播、电视上对语言规范问题进行探讨，他们撰写的著作也更注重普及性，书名往往带有“普及”“初级”或“基础”字样（Munteanu 2004d）。

扫盲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先后经历过几个阶段，以社会主义时期的成效最为显著。直至19世纪中叶，罗马尼亚各公国都未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1899年的数据显示，罗马尼亚民众的识字率仅有22%。到1912年，这一比例提升到39%，但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军队中有



65%的军人是文盲，而在德国军队中这一比例仅为0.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益于农业改革等措施，罗马尼亚经济迅速增长，教育文化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识字率攀升至57%（1930），但仍落后于保加利亚（60.3%，1926）和匈牙利（84.8%，1920）等邻国。从地域分布上看，在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巴纳特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一些少数民族裔在封建公国时期享有特权，有着优良的教育传统，因此识字率相对较高，罗族的整体文化水平却不容乐观。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46年提出了“通过文化开启民智，实现人民民主”的宏伟目标。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文盲率降低到13%（Manea 2011）。1948年8月，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Marea Adunare Națională）主席团通过法案，决定实行教育改革，并将扫除文盲列为核心任务。这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公共教育部作出的所有与扫盲相关的决定都必须经过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的审核（ANIC 1951），管理体系高度集中化，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每月向公共教育部汇报出勤率和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意见。1948年版的教育改革法案要求将基础教育普及到所有适龄儿童和所有不识字的人群，相关课程历时1—2年，覆盖14—55周岁的对象，使用统编教材。课程包括罗语、算术、罗马尼亚历史和地理，以及卫生习惯。从课时分配上看，罗语（包括阅读、语法和作文）和算术最为重要：在城镇地区，罗语课和算术课的课时数相当，然而在乡村地区，罗语课的课时几乎是算术的4—5倍（ANIC 1951）。1950年启动第二阶段扫盲运动时，课时分配发生了逆转，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算术课的课时均达到了罗语课的2—3倍。各科课时的增减恰恰说明，经过第一阶段的努力，罗语的普及率和全民（罗语）识字率已经大幅提升。虽然扫盲运动并未规定教学语言，但在实施过程中，少数民族语言师资及教材短缺的现象普遍存在，致使民族语言的扫盲成果远远不及罗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罗语的通用语地位。除扫盲运动外，社会主义时期罗马尼亚全民语言能力，特别是识字率大幅提升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学前教育的普及。为了解放女性劳动力，让更多妇女回归劳动岗位，罗马尼亚在1948年提出了学前教育入学率超90%的宏伟目

标。1950—1955 年间，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的数量从 20.9 万激增至 40 万，占适龄儿童总数的 40%。其范围不仅包括城镇，还涉及广大乡村，以便让更多妇女在农忙时腾出手来参加生产，部分幼儿教师还在闲暇时到扫盲班兼课。

1.4.3 “全面向东”的外语教育路线

罗马尼亚在外语能力建设方面起步较早，中世纪各公国开办的教会学校和世俗学校不仅讲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古斯拉夫语等古典语言，有些还开设法语、德语、俄语、匈牙利语等现代语言课程。¹ 1864 年版《教育法》除了规定罗语为初、高中阶段必修课外，还明确将拉丁语、古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列入课程体系 (Bunescu *et al.* 2004: 32)，并规定女子中学的学生也必须选择其中一门现代语言作为必修课。此后颁布的各种教育法规普遍规定将 1—2 门现代语言作为中学阶段的必修课，1898 年颁布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法》中增列了英语，但法语和德语仍是首选的外语科目。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罗马尼亚在外语语种选择上出现了明显转向。1948 年，教育部下令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将俄语列为必修课。高等学校大量设立俄语院系（有些包含其他斯拉夫语）或俄语专业，一些具有悠久教学传统的西方语言专业师资队伍被压缩，课时被削减。与此同时，增设了一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语言专业，以及东方语种专业。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绝大多数大学的英语专业都被解散，或仅保留极少编制，唯有布加勒斯特大学的英语教研室得以完整保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在 1949—1950 学年，布大就新设了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 5 个专业，1957—1958 学年又增设了乌克兰语专业。该校的绝大多数东方语言本科教学也在社会主义时期起步，包括中文（1956 年开设）、阿拉伯语（1957 年开设）、土

1 罗马尼亚人建立的封建公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邻国的管辖或保护之下，国内有大量跨境民族存在，德语、俄语、匈牙利语等语言在特定时期具有官方语言或地方性通用语的地位，当时不能被看作外语。



土耳其语（1957年开设）、印地语（1969年开设）、波斯语（1974年开设）、日语（1975年开设）。部分语种的开设与当时的外交走向密切相关，得到了罗马尼亚和对象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例如布大中文专业就是依据1956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第三条第三款“互派中文和罗文教师，以支持对方国家的中文教研室和罗文教研室的教学工作，并定期互相供给中文教研室和罗文教研室书籍和专业刊物”设立的，同年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了罗语专业。1978年版《教育法》明确要求，学生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必须选择学习两门外语。在高等教育阶段，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必须进一步强化中学掌握的外语知识（Bunescu *et al.* 2004: 246-370），俄语通常是默认的第一外语选项。20世纪80年代末，罗马尼亚领导层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外交政策趋于保守，一些西方语言的使用受到限制。由于某些跨境语言兼具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属性，因此相关举措不仅影响到了外语的使用，还对少数民族语言权利造成了影响。例如，1985年罗政府以电力不足为由关闭了所有用外语广播的地方电台，包括大量匈牙利语和德语电台，而这两种语言正是罗马尼亚境内最主要的两种少数民族语言。